



Review of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ories

美国军事情报 理论著作评介

[第二辑]

张晓军 主 编
任国军 副主编

时事出版社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

(第二辑)

张晓军 主 编

任国军 副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 (第二辑) / 张晓军主编, 任国军副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232-329-2

I. ①美… II. ①张… III. ①军事—情报学—著作—简介—美国
IV. ①E712.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73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0.75 字数: 73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2000年，我们从美国公开出版的数百种情报研究著作中，遴选出24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评介；2005年，《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就我们的学术视野所及，这是国内系统介绍与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情报理论成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此后，我们坚持在这一领域开拓、发掘，未敢有丝毫懈怠。现在，我们这几年在美国情报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我们之所以把比较大的精力放在研究与评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军事情报理论原著上，连续推出“著作评介”类研究成果，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一直占据着该领域的前沿，其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就是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各类情报著作。据我们所知，美国情报理论著作的出版量是全球最大的，每年正式出版、发行的各种情报类著述数以百计。长期跟踪、深入挖掘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既是我们研治军事学的分内之责，也是对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的重要补充。当然，数量如此庞大、内容如此丰

富的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成果，自非一二辑“著作评介”所能涵盖。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努力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研究领域，尤其是军事学、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外来理论借鉴。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情报理论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发展，至今仍势头不减，且愈加蓬勃兴旺。持续跟踪其发展，可以不断地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动态信息和最新理论参照。作为当今世界情报实践最丰富、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情报理论最成熟、更新最迅速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世界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出版以来的这几年，也是美国大力推进情报改革与转型、情报理论与实践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对此类著述进行重点研究、详细评介，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国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同时还可以与“评介”（第一辑）形成主题上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从而使这两辑“评介”真正成为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相得益彰的整体。

三、《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的出版，为国内的军事情报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事情报学学术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扩展，受到了各方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尤其是，“评介”（第一辑）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方难得的平台，使许多年轻的学子得到了锻炼、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为我们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了“评介”（第一辑）的发凡起例，适时推出《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可以满足学术界的期待。

与“评介”（第一辑）一样，《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在素材选取、内容划分等方面也尽可能做到了“集中、聚焦、有代表性”，即尽量选取那些主题集中、内容聚焦、观点具有代表性的原文著述作为评介、研究的对象。在体例安排上，我们也尽可能沿用了“评介”（第一辑）的一些较为成功的做法。全书分三篇展开评介论述：第一篇所选书目主要涉及军事情报改革与转型，尤其是美国军事情报改革所面临的困顿、瓶颈、根源等问题；第二篇主要就军事情报与（国家）战略、指挥决策的关系进行了评述；第三篇集中讨论了军事情报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情报的历史发展情况。除了作为全书主体内容的著述评介文章外，我们还选择翻译了所评介著作的部分重点章节附于文后，以便与评介部分相互印证、互为参照。

本课题由我主持并负责。课题的提出与论证、结构体例的设计、提纲的拟定，以及组织规划、修改定稿等，均由我负责；任国军博士，在选题论证、组织协调、文稿校改等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课题组成员主要包括梁陶（第一篇第一章）、梁晓燕（第一篇第二章）、海玉（第一篇第三章）、陈渝（第一篇第四章）、郑常松（第一篇第五章）、韩晓（第一篇第六章）、叶晶（第一篇第七章）、宋应财（第二篇第一章）、胡荟（第二篇第二章）、翟晓苏（第二篇第三章）、索云鹏（第二篇第四章）、赵世兴（第二篇第五章）、秦玲（第二篇第六章）、汪明敏（第二篇第七章）、黄勇（第二篇第八章）、鲁猛（第三篇第一章）、孔翔宇（第三篇第二章）、李伟（第三篇第三章）、尹先慧（第三篇第四章）、熊道春（第三篇第五章）、薛峰（第三篇第六章）等，汪明敏、胡荟等人还参与了部分文稿的校订修改。

我们工作所在学院的各级首长、机关，对本课题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大力的支持；时事出版社的苏绣芳女士催稿热情有方，责任编辑谢琳审稿细致严谨，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

课题完成了。限于我们的水平，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张晓军

2010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情报改革与转型

第一章 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

——《军事情报与信息爆炸》评介 (3)

第二章 “9·11”事件后的反思

——《聚焦情报问题》评介 (35)

第三章 情报改革路在何方

——《十字路口的美国情报——改革议程》评介 (61)

第四章 情报系统的“维修”建议书

——《维修间谍机器——为 21 世纪美国情报
做准备》评介 (91)

第五章 步履维艰的情报改革

——《重建情报——为了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评介 ... (127)

第六章 情报体制改革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设计的缺陷——中情局、参联会以及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评介 (151)
第七章 非传统威胁下的非对称情报优势	
——《新情报技艺——面临非传统威胁时获取 非对称优势》评介 (176)

第二编 情报与战略、决策

第一章 大视野下的情报著作	
——《战争、战略与情报》评介 (217)
第二章 对经典的延续	
——《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情报》评介 (255)
第三章 欺骗与突袭的理论思考	
——《军事欺骗和战略突袭》评介 (286)
第四章 情报与决策关系的历史考察	
——《美国战略大失误——情报分析与国家 安全政策：1936—1991》评介 (312)
第五章 情报与决策关系的另一种考察视角	
——《领袖与情报》评介 (335)
第六章 情报失误的制度根源	
——《秘密情报为什么会失误》评介 (375)
第七章 情报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角色	
——《危机管理中情报的功用》评介 (407)

目 录

第八章 知识时代的情报界管理指南

——《情报企业中的知识管理》评介 (432)

第三篇 情报历史

第一章 冷战中的情报工作

——《情报战——洞察当今先进技术冲突的秘密世界》评介 (471)

第二章 探索者的足迹

——《政治情报量化分析方法——中央情报局的经验》评介 (494)

第三章 美国陆军情报机构发展的一面镜子

——《军事情报》评介 (520)

第四章 多国情报合作的历史探讨

——《美—英—加情报关系：1939—2000》评介 (544)

第五章 揭开历史的面纱

——《神圣秘密——改变美国历史的苏联情报活动》评介 (589)

第六章 走出困境 面向未来

——《军事情报与大学——矛盾关系研究》
评介 (616)

第一篇

情报改革与转型

第一章

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

——《军事情报与信息爆炸》^① 评介

一、军事情报概念的界定

作者威廉·阿格莱尔在本书第一章中重点讨论了情报界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什么是军事情报。他从情报、国家情报等概念入手，对情报进行了相应的分类，进而阐发了自己对军事情报这一概念的独到见解，并较为严谨地界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阿格莱尔看来，最广义的情报可以定义为用以满足关于未知事物特殊信息需要的活动。现今的情报与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不仅是信息或通过秘密途径搜集的信息，还包括了对系统环境信息的搜集和积极利用。^② 现今的情报更多的是一种能力，一种可以根据系统环境信息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的能力。社会各决策层虽然对情报都有所需求，但最主

^① Wilhelm Agrell,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weden: Research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und, 1979.

^② Ibid., p. 1.

要的需求还是来自于国家安全领域。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多数情报被理解为国家情报的同义词了，即被不同政府部门机构用来支持国家政策的情报。这种国家情报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对内情报与对外情报。对内情报是被用来对付敌对势力自身内部结构的，如外国间谍、国际恐怖分子、非法反对势力，等等。^① 对外情报则是用来针对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从而能够为自己的决策者提供充足的信息。^② 由于这两类情报在理论和实践中很容易被混淆，所以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关于情报的定义，尤其是对外情报，对于超级大国而言，在现实中并不能与这些超级大国的行为完全相符。也就是说，情报的定义并不具有现实的普适性。基于此认识，像用于执行积极行动，影响他国或组织机构局势的隐蔽行动与颠覆活动并没有被作者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按照阿格莱尔的观点，对外情报在实际意义上具有政治、经济、心理或军事上的属性，因此可以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心理情报以及军事情报四大类。他将其中的军事情报作为本书所探讨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军事情报与其他情报的相关性，否则就无法客观、准确地理解军事情报的真正涵义。阿格莱尔将军事情报分为战略、战役、战术等几个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的指导原则都有着相近之处。因为无论是哪个层级上的军事情报，都体现出一种对敌人相关信息的需求，此种需求来源于政策制定的过程，并可以通过情报功能的现有“知识”或更进一步的信息搜集予以满足。^③ 虽然军事情报只是国家情报总体功能中有限的一部分，只在军事威胁或进行公开对抗的形势下，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但在和平时期，军事情报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平时期军事情报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三方面：为长远决策提供基础，主要关注国家安全、武装力量、民防政策等的发展；为武装力量提供战术和武器系统所必需的有关外国军事功能的信息；提供外国军事组织的变化的早期警报，这在不远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进攻筹备）。^④ 而且这些功能在现实中正朝着一种扩大的方向发展，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情报功能都或

① Wilhelm Agrell,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weden: Research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und, 1979, p. 1.

② Ibid.

③ Ibid., p. 4.

④ Ibid.

多或少地呈现出一种远超出其原始职责影响力的发展趋势。

二、信息爆炸对军事情报的冲击

威廉·阿格莱尔在本书第二章回顾历史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军事情报却没有发生什么深远的变化。然而，随着核武器与电子战场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军事情报的前提也随之发生了决定性改变。当今社会同军事情报一起，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爆炸的冲击。

在信息爆炸这一大前提下，可获得的军事情报在数量上大幅度提升，但从长远来看，信息爆炸也必然会对军事情报的管理方式带来诸多深远影响。信息爆炸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军事情报：

第一，可获信息总量急剧增加。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① 与信息有关的一系列新科学与新技术也随之应运而生，信息的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导致了一场信息革命的降临。这场革命包括两个部分：积累信息和散布信息。今天，积累知识的速度是空前的、爆炸性的。^② 按照“莫尔法则”（Moor Law），信息系统的容量不只是随着时间在增加，它是以一种加速度在增加，呈现出一种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仅世界各地每天公布的科学信息，其量之大，可填满 7 套 24 卷一套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空前的、爆炸性的是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还有以光速——尤其是通过卫星——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③ 因此，几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信息量都在迅猛增长，其中与各种决策、军事行动相关的信息量也随之同步增加。而这些信息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报搜集方式来获得的。

第二，情报用户的需求大幅提升。在一个发展缓慢的世界里，讨论情报

^① 闫晋中：《军事情报学》，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1 页。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36 页。

^③ 同上，第 636—637 页。

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情报需求随之大幅提升，情报机构的任务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快速迈进。在情报需求中，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早期预警”功能，这是一种对外军的部署、行动、实力、战备等进行严密监视的能力，并为政治和军事决策者提供足够的相关预警。^①这就导致了对细节情报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要求情报机构须对大量的目标加以关注。而且，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威胁可能会更快地出现和发生变异。总之，情报规划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威胁的不同和数量的大增，而且是威胁环境的本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②“9·11”事件后，各国对反恐等非传统领域的情报需求的上升以及对各种细节情报需求量的增加就是突出例证。然而，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细节性的情报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情报搜集系统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超过了情报机构的载荷能力。

第三，情报资源分配不均。许多情报官员都深刻认识到信息技术正在迅速发展，情报界必须对此加以利用。事实上，情报界一直都是运用信息技术的先行者，信息革命中的许多核心技术已经为情报界所采用。^③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大部分情报机构在情报资源分配上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情报搜集方面对侦察卫星、高空侦察机、电子监听站以及特种网络等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在情报分析方面却并没有同步发展。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情报搜集技术远远超出了分析的地位，它正在支配整个情报工作。的确，要满足一国对别国相关情报的需求离不开信息的搜集。然而情报搜集系统通常只能提供数据和信息，却不能产生知识或理解力。信息只有经过解读才会被赋予意义，^④即搜集到的信息要最终成为情报产品就必须经过解读与分析，但情报资源的分配不均却使搜集到的情报远远多于能被处理或使用的。太多的情报被“更为复杂的技术搜集系统”搜集，并“已经导致了情报操作系统的总量过剩”。^⑤

^① Wilhelm Agrell,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weden: Research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und, 1979, p. 17.

^② [美] 布鲁斯·伯尔考威茨、阿兰·古德曼著，张力等译：《绝对真实——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 同上，第51页。

^④ 张长军：《美国情报失误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⑤ 张晓军主编：《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总之，在信息爆炸的影响下，不同领域的军事技术都相应地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具有良好装备的情报组织能够搜集到关于外国军队装备、部署和行动的越来越完整的图片。侦察卫星和高空侦察机在全球层次为超级大国提供信息，而在战场层次，雷达设施，信号情报与地面、空中传感器则使对军事行动的每个细节进行监视成为可能。然而作者却提醒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急剧提升的信息搜集手段并没有提高军事情报的效率。急速增长的信息总量造成了大量原始材料对军事情报的扼杀，因为大量原始材料占据了情报资源的一大部分，而这些资源或多或少地被浪费在解释和分析不相干的材料之上。于是，信息爆炸对于军事情报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命题。

三、核心命题：“情报过度”（Intelligence Overkill）

威廉·阿格莱尔在本书第三章中详细讨论了二战以来信息革命给军事情报能力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并提出了“情报过度”这一核心命题。因此，本章成为全书的灵魂。

在 20 世纪以前，情报搜集能力十分有限，这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误区，认为信息不足是限制情报分析的主要障碍。^① 然而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随着情报搜集能力（主要体现在搜集技术方面）的迅猛发展，威廉·阿格莱尔认识到对于情报分析工作而言，信息过载甚至比信息过少更为有害。大多数情报分析失误不是因为没有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而是因为没有从搜集到的海量信息中提取出有用的情报。一旦在现实中将情报搜集能力置于优先地位，以牺牲情报分析能力为代价，或没有对情报分析能力进行相应的提升，那么情报分析工作就会被原始的甚至是只经过初步解释的素材所淹没，从而无法做出正确的情报评估，这就是所谓的“情报过度”。^② 任何情报机构都存在一个信息的最大承载问题，如果搜集到的信息总量超过了崩溃

^① Richards J. Heuer, Jr.,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② Wilhelm Agrell,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weden: Research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und, 1979, p. 23.